

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

魏国英

摘要: 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逐步构建,话语体系不断完善。这期间,中国高等院校先后出版了10本女性学原理类教材,它们梳理了中国的女性学学科命名、价值取向及妇女运动类别界定等基本概念与理论范畴,阐述了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的基础、来源与动力。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聚焦女性现实热点问题,运用中国话语对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路径进行学理阐释,从而深化了中国女性学学科体系的内涵。

关键词: 女性学; 妇女运动; 学科建设; 话语建构

DOI: 10.13277/j.cnki.jewu.2019.06.001

收稿日期: 2019-07-08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9)06-0005-07

作者简介: 魏国英,女,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学基本理论、女性现实发展问题等。100871

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中国女性学,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和妇女理论研究深入的产物。进入21世纪,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构建逐步完整,话语体系逐步完善。本文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院校先后出版的10本女性学原理类教材和相关论著,对中国的女性学话语建构及其模式特征进行探讨。

一、女性学学科命名

“话语”一般是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话语建构则指语言的建设与构成。中国的女性学话语建构,既包括学者在汉语语言中创制适当的词语来标记新概念和新事物,形成新术语,又包括人们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进行学科交流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学科话语的建构服务于学科理论体系,推动着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经历了学科初建时期的探索与争鸣,到20世

纪末,中国女性学学科命名的共识度提高。2000年至2009年间,国内高等院校相继出版的10本女性学原理类教材,均以《女性学》《女性学导论》《女性学概论》《女性学教程》冠名,可见,将这一学科命名为“女性学”,已得到了相当多的学者赞同。当然,对此称谓,学界仍未达成完全一致,也有学者仍将其称为“妇女学”“妇女研究”“女性研究”,或“性别研究”。^{[1] 259-260}

1. 在当下语境中,“女性学”的称谓更为准确
为什么把这门学科称为“女性学”,而不称其为“妇女学”呢?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在学科命名时,考察了“女性”与“妇女”这两个语词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差异。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话语中,“妇”与“女”是两个各有特指的词汇,不连在一起使用。清朝官吏陈弘谋在《教女遗规》序中写道:“夫在家为女。出嫁

① 以出版年代为序,10本女性学教材是:(1)《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女性学》,啜大鹏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3)《女性学》,罗慧兰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4)《女性学》,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6)《女性学教程》,周乐诗主编,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7)《女性学导论》,叶文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女性学导论》,祝平燕、周天枢、宋岩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女性学(第二版)》,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0)《现代女性学概论》,黄蓉生、任一明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21] 1896年,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提出:“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的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他还说:“女权运动能否有意义有价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实自觉的程度何如。”^{[3]87-88} 梁启超在文中分别使用了“妇人”与“女子”两语词,以示二者的差异。著名思想家严复在论述男女不平等是人为造成时指出:“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4]62} 他使用的则是“妇人”一词。可见,在当时的语境中,“妇”与“女”是分开使用的。

20世纪初,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运用“女子”一词来泛指女人。1903年,兴中会会员金天翮撰写的中国第一本阐述妇女解放的专著《女界钟》问世,全书共分为“女子之道德、女子之品行、女子之能力、女子教育之方法”^{[5]1} 等十节,皆用“女子”指称女人群体。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女性”和“妇女”两词出现,并逐渐成为用来指称女人的社会用语。而“妇女”一词在使用上居于相对突出地位,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后。其时,上海创办的《慈俭妇女》、广州创办的《抗战妇女》、汉口创办的《妇女职哨》、重庆创办的《职业妇女》、桂林创办的《妇女岗位》等刊物,均冠以“妇女”一词;各地相继成立的女界组织,如上海妇女教育馆、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甘肃妇女慰劳分会等等,也大多以“妇女”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流社会继续延用“妇女”一词来泛指女人,如全国女界组织称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女界报刊定名为《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等。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一些学者开始选用“女性”来指称女人群体。

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女性”与“妇女”两语词在内涵上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用来指称女人。但在外延上,二者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妇女”多被用来指称那些有一定年纪和经历的女人,或有婚史的女人;而“女性”涵盖的范围则要大一些,她既可指称已婚的女人,也可以指称未婚的成年年轻女子,还可包括未成

年的少女、女童。^{[6]10}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学的女生将3月7日定为“女生节”,以区别于“三八妇女节”,这表明在女大学生眼中,女生与妇女是有差异的。因此,21世纪以来,高校出版的女性学学科的相关教材,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女性学”的称谓。编著者们认为,在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中,“女性”是一个可以被年轻、未婚女性接受的,超越社会关系的泛指女人的合适概念,而这门学科又是从性别角度,把人类的一半作为对象客体来研究,因此,称“女性学”可能比称“妇女学”更科学、更准确些。^{[6]10}

这样的界说,当然是基于中国的语言文化背景。而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妇女”“女性”“女子”等语词内涵的界定,是不尽相同的,在使用上也是有所区别的。

2. “女性学”的命名,规范了学科的属性与特质
女性主义(feminism),亦称女权主义,是西方在争取妇女权益进程中兴起的,反对性别压迫、剥削与歧视,追求男女平等的一种社会思潮与政治运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诸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众多流派。尽管不同流派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观点存在分歧与差异,但它们都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7]27} 因此,各流派的理论研究成果相互影响和渗透,共同为推进全球的性别平等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很快在学界广泛传播,为中国学者解析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中国女性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元素。然而,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深刻影响的中国女性研究界,在进行学科命名时,却没有将其称为中国的女性主义,而是命名为中国的女性学。从高校出版的女性学原理类教材中,可以看出学界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没有被学界普遍认同

在西方学术界,女性主义几乎成为女性研究的同义词,以女性主义涵盖女性研究,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在现代汉语中,“主义”一词比较宏大,通常是指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

来,学界引进了女性主义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但基本上处于译介阶段,比较多的是学习借鉴其多样性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立场、主张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学界并不为每个人所普遍接受”。^{[6]4}有学者提出,女性学是社会科学,“它的最直接的指导原则及方法论原则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他科学对女性学研究也都有指导或借鉴意义,但它们都只限于对女性理论研究的某一局部而言,而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指导意义,则是对女性学的整体而言的”。^{[6]21}更有学者强调,女性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女性问题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论,是解放女性的强大思想武器”。^{[9]7}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妇女的现实需求出发,采用女性学的学科定位,成为中国女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

其二,强调女性研究的学科属性

汉语中的“女性研究”和“女性学”两个语词,均可以与英语中的 Women's Studies 相对应。中国女学界之所以选择女性学,而不用女性研究来命名,是考虑到在中国国情与汉语语境中,女性学可以更清晰地表明女性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更有利于传递 Women's Studies 中所具有的学科本身以及在这一领域所从事的研究这两重意义”。^{[9]3}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日本女性学研究会理事长的富士谷笃子主编的《女性学入门》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学者对该学科的命名以及对学科的界定,即“所谓女性学,是从尊重女性人格的立场出发,跨学科地研究女性及妇女问题,并以女性的观点重新研究既有学问的一门科学”的表述^{[10]1},也给予中国学者以诸多启示与借鉴。

其三,期盼女性研究进入学科之林

从世界范围看,女性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它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1969年,在全美妇女组织代表参加的一次集会上,女性主义学者呼吁在大学开设女性研究的学术讲座。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圣地亚哥大学率先拟定了女性研究教学大纲并付诸实施。此后,女性研究课程在全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至80年代初期,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的相关课程已达3万多门;到1991

年,68%的美国大学都提供了女性研究的课程。^{[11]2}

中国高校的女性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步的。初始阶段与美国高校的进展状况有相似之处,也是从女教师的研究沙龙开始,进而开设女性主义讲座课,开设各学科的女性研究专题课,设立女性研究机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女性研究要在中国高校中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进入学科主流,建立独立的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因此,中国高校的女性研究从起步起,就明确表示认同既有学科体制、争取体制内资源的意愿,从未整体呈现反学科传统和反既有体制的倾向。20世纪末以来,学界的这一认识更为清晰。学者认为,“女性学学科的创立是发展妇女运动、深化中国女性研究的客观要求”^[12],“如果没有女性学学科建设,女性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13]明晰的理念推动学界以“女性学”命名,以便于开展更加积极有效的学科建设。

二、妇女运动的界定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引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广泛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于女权运动及其三次高潮的阐释。在已有的10本中国女性学教材中,在梳理世界范围的妇女运动和中国的妇女运动时,均注意了对西方女权运动的评介。然而,编著者在界说全球范围的妇女运动时,更关注多种形态妇女运动的差异,一般均采用“妇女运动”(The Women's Movement)来表述全球范围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女权运动”(The Feminist Movement)的称谓。

1. 世界妇女运动是对不同地域国度、阶级阶层、多样形态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恰当表述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妇女运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妇女自身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而掀起的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的妇女群众的运动。^{[14]193}妇女运动的特点是以妇女为活动中心,以妇女最终获得彻底解放为目的。^{[15]60}

学者依据领导阶级和根本斗争目标的不同,将妇女运动分为不同的类别。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以求得两性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运动,亦称女权运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广大劳动妇女为主力军、以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女性翻身解放为目

标的妇女运动,也被称作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各界妇女参加,以实现消灭阶级与妇女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运动;还有联合国推动、以“国际妇女节”和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及后续会议与行动为主线、以“平等、发展与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等等。^{[14]194-208,[15]66-74}学者普遍认为,妇女运动通常伴随政治革命或社会改革的发生和发展而发生和发展,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关联着社会变革和诸多方面的男女平等,很难用女权运动这一种形态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妇女运动的全貌。

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大会秘书长格惠鲁特·蒙盖拉指出:“‘妇女问题’是世界事务中列于人权、民主、环境、和平和发展这些基本议题之后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妇女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这些基本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我们将研究如何继续这个进程,以结束妇女问题与时代主流的分离”;“作为妇女,我们宣称这些议题也是我们的议题——所有问题都是妇女问题”。^{[16]68}蒙盖拉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女性问题与世界发展主题的一致性与独特性。

当然,由于制度结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和信仰的差异,不同地域国度、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对世界女性问题和妇女运动、本国女性问题和妇女运动的认知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近200年来世界妇女运动进程表明,不同身份的女性群体,均存在与本类别的男性平等发展并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问题,这是各层级女性共同的权益诉求。因此,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妇女运动进程中努力寻找共同权益交汇点,通过交流、交融与合作,求得在求同存异中达到共同进步与发展的目标,这是当下世界妇女运动的特色,也是今后全球男女平等发展的趋势,符合妇女运动的初衷,也是妇女的根本利益所在。

2. 中国妇女运动可以准确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在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中争取自身解放与发展的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和比较纯粹的封建社会。1840年后,中国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演变。1901年《辛丑条

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此后,中国人民肩负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任务。中国的妇女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

一是1840年至1919年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这一阶段的妇女运动可以分为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太平天国时期,正式兴起的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其时的妇女运动有着强烈的爱国救亡和反封建礼教的色彩,妇女作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9]227-229}

二是1919年至1949年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大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等五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相一致的。^{[14]210}

三是1949年10月以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妇女运动。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妇女运动围绕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开展;1957至1965年,妇女运动围绕妇女广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进行;1966年至1976年,妇女运动遭受了挫折;1976年10月以后,以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妇女运动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又蓬勃发展起来。^{[15]64-65}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妇女运动历程中,劳动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始终是其核心和主题;坚持把妇女的解放与劳动人民的解放、把妇女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民解放中实现妇女的解放、在民族发展中实现妇女的发展,始终是其不变的路径选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和业绩。准确地说,中国的妇女运动就是广大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翻身解放和进步发展的运动,可以简称为中国妇女运动。

在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也曾出现过先进知识女性发起的以争取选举权为主旨的女性参政运动,简称为中国女权运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妇女活动的重心由参加军事斗争转向要求参政的政治斗争,中国近代女权运动由此兴

起。1912年年初,林宗素女士代表1911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女子参政同志会”,面见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提出了女性参政的要求,孙中山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开,女界大为振奋,女性参政组织纷纷问世。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着手制定约法,以唐群英、林宗素为首的20余位女界代表联合上书参议院,要求“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17]而3月11日,在临时政府公布的临时约法中,却全文没有提及女子参政权,也避而不谈男女平等的主张。这一状况引起了女界强烈愤慨。女界参政组织再度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一些女性甚至强行闯进参议院会场,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请愿行动。但参议院反对女性参政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在4月1日公布的参议院法中,更直接剥夺了女性选举权,这促使女界的抗争进一步组织化。女子参政同志会与神州女界参政同盟会、女子同盟会等多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等团体也相继崛起。

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北迁往北京。8月10日,在临时政府公布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仍然只规定男性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得知这一消息后,数十名北京知识女性涌入参议院,宣称要以最激烈的手段加以抗击,唐群英等人还不顾巡警的阻拦,进入会场,直接与议员们辩论。知识女界的领袖们也再度上书参议院,要求给予女性参政空间。10月,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成立本部大会,唐群英在会上明确提出:“所以现今争选举权,是第一次国会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将来争被选举权的关键。”^[18]然而,11月,参议院仍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女子选举权案。1年后的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竟被内务部勒令解散了。至此,民国初年的女权运动在袁世凯政权的压制和破坏下,在传统封建势力的一片反对声中,只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这次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基本是上层知识女性,范围小,时间短,影响力弱,还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和性别文化,但先进知识女性提出的“男女

平权”的响亮口号,则贯穿了整个妇女运动的全过程^{[19]40},鼓舞中国妇女前赴后继地不懈奋斗。

三、学科价值取向

中国学者认为,女性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女性,也是为了男性,即为了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进而实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与整个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0]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价值取向的表述,是深深植根于数千年来中国性别生存与发展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男女两性共同推动妇女解放的实践传统,植根于中国妇女解放与全体中国人民的解放基本同步的革命传统,植根于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思想传统的。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多民族交融共处,这一独特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性别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男性中心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了妇女的生存发展和社会作为。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中央集权的统治与男尊女卑的训教并不均衡,其在远离皇城的边远地区会相对弱化,为弹性、多元的性别发展预留了空间。例如,在江浙和福建沿海地区,至今仍存有一些被人供奉的“妈祖庙”;在湖南南部汉族与瑶族杂居的江水一代,还保留着拜“姑婆”的习俗;云南和四川的摩梭人,仍在继续“走婚”模式等,都说明我国传统性别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还在一定程度存有母系社会的遗风。^{[21]9-11}这就是说,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形成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并没有将妇女完全隔绝于社会生活之外,因地域、民族、阶级阶层差异而形成的多元性别文化,为今日中国性别平等与和谐发展注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

近现代以来,中国具有先进思想的男性,不仅积极倡导“解放妇女”,参与到妇女解放的队伍中,而且还担负起了领导者或指导者的重任。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旗手谭嗣同、孙中山,到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领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他们都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观念,并身体力行地推进“天足运动”,创办女子学校,动员女工农妇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让“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① 林宗素(1878—1944),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中国同盟会较早的女会员之一,上海报界著名女记者、女编辑,女权运动先驱。

②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县人,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著名女子教育家,女权运动领袖,辛亥革命功臣。

思想理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日渐深入人心,促使妇女的解放与发展在人类解放和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得以实现。具有两性平等意识的男性的思想和行动,在中国的妇女解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为当今男女两性携手前行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范例。

中国妇女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广泛的社会解放与进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发展始终被纳入全体人民的解放与发展进程中。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男女平等一直处在国家法律政策视野之内,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并认同这一点,中国妇女权益及时拥有了“打出幽灵塔”的制度保障,并得到了扎实稳定的推进,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本土特征,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独立的女权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的女性研究承续了中国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妇女解放进程的文化传统,从起步时期就坚持认为,“男性是研究女性学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男性的参与、理解和支持始终是推动妇女解放实践向纵深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男女共同研究男女平等问题,“得到的认识会更全面、更具有客观真理性”;^{[9]8}坚持认为,“性别研究是与阶级、种族并列的视角观点和方法,不是仅仅属于女性学者的事情,不是男性不宜的事情,不能以生理性别来划分界限,更不是与男性无关的研究”;^{[2]11}坚持认为,陈旧性别制度与落后性别文化的链条同时捆绑着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性别分工,既剥夺了女性社会参与的权利,又使得男性承受了过重的

社会责任和压力,限制了他们充分参与并享受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和机会,限制了他们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2]81}因此,中国的女性学研究从起步开始,就不排斥男性,不拒绝男性学者参与,而是“意在突破狭隘的男性视界疆域,秉持一种两性和谐、平等发展的‘生态学’视野,寻求两性之间的内在整合与相互作用”;^{[23]10}它反对父权制,反对男性中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但从不把男性作为对立面,而是努力寻求打破落后性别制度与腐朽性别文化的桎梏,探索实现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说,中国的女性学研究,着力在传统学术和学科中增加性别分析视角,解析无性别、去性别的弊端,“不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性别和谐理论”^{[24]46},对学术和学科的繁荣与进步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当然,对传统的社会性别结构的改造,对男性中心性别文化的变革,可能会触动一些男性的既得利益,使一些男性产生心理和行为的不适应感,这需要男性做出积极的调整和相应的改变。

中国女性学话语建构的基础、来源和动力,取决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和女性发展实践,取决于中国女性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取决于中外女性理论的交流与碰撞。面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发展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总结女性发展的路径与经验,实事求是地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术语、新范畴、新表述。总之,推进女性学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 [1] 陈方,王珺.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综述[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 陈弘谋.教女遗规译注[M].《五种遗规》译著小组,译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 [3] 梁启超.变法通义[M].何光宇,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4]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5] 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6]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7] 祝平燕,等.女性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8] 周乐诗.女性学教程[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 [9] 啜大鹏.女性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 [10] (日)富士谷笃子.女性学入门[M].张萍,译.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 [11] 刘倪.西方女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2] 啜大鹏.试论创建女性学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 [13] 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 [14] 仝华.女性问题与妇女运动[A].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5] 韩贺南,张健.女性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 [16]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 [17] 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N].时报,1912-02-27.
- [18]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志盛[N].女子白话旬报,1912-11-02.
- [19] 罗慧兰.女性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 [20] 魏国英.女性学研究体系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1] 骆晓戈.女性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 [22] 彭珮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3] 黄蓉生,任一明.现代女性学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4] 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秦 飞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WEI Guoying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has been gradually constructed and its discursive system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in the 21st century.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published 10 textbook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women's studi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se textbooks defin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categories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such as its official name, values and the categories of women's movement.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has been based on inheriting fin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advanced cultural achievement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serves its theoretical institution,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nhances the ability to theoretically interpret Chinese path on gender equality, and deepen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women's move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